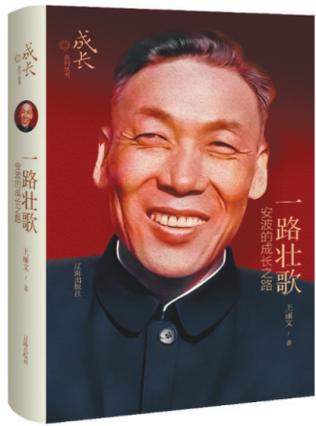


沃土之上 歌以载民

本报记者 赵雪



80余年前，延安窑洞里的那盏汽灯，照亮了中国文艺的前行之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这一根本命题，如巨石投湖，激起的涟漪至今仍在我们的文化河流中荡漾。由辽海出版社推出的《一路壮歌——安波的成长之路》，正是一部以人民音乐家安波的生平为棱镜，折射那段光辉岁月，并深切回应这一永恒叩问的厚重之作。作者王丽文以学者之严谨与赤子之热忱，通过安波从“小五黑”到“民歌大王”的生命轨迹，不仅复原了一位艺术家的心灵地图，更引领我们重返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探寻“为何扎根”与“如何扎根”的实践真谛。

安波的艺术启蒙，深植于中国乡村最质朴的土壤。书中开篇即定格于山东牟平庙沟村的黄昏：母亲哼唱的乡土小调与风声、雨声、劳作声交织，构成他最初的艺术世界。作者以诗性笔触描述了安波的童年，而正是这种源于乡土的滋养，赋予

了安波对民间音乐的本能亲近——他自幼便能从胶东大鼓的顿挫中听出生活的悲喜，从秧歌调的明快里感受到生命的律动。正如书中所揭示的，这种“泥土里长出的音乐感”，为他日后深入民间采风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将这段经历简单归因于“天赋”，而是强调其与土地的共生关系：安波的童年没有乐谱与琴键，却有田野间的虫鸣、碾坊里的号子、节庆时的锣鼓。这种沉浸式的民间艺术熏陶，使其形成了“音乐即生活”的认知底色。安波从母亲的哼唱中听出了“比任何学院派理论更鲜活的情感语法”。这也是他日后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迅速共鸣“大鲁艺”理念的精神伏笔。

如果说乡土滋养赋予了安波的“根”，那么1936年的上海之行则赋予了它的“魂”。书中以戏剧性的笔触还原了关键场景：青年安波作为山东救国团体代表，在黄浦江畔目睹刘良模指挥上千民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一场景彻底重塑了他对音乐的认识：艺术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唤醒民众、鼓舞斗志的武器”。书中引用的那句誓言——“活得苟且，不如死得壮烈”，也标志着安波从音乐爱好者到革命文艺战士的蜕变。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安波的觉醒并非单纯的激情使然，而是源于对民间音乐“动员潜力”的深刻洞察。他意识到，那些在乡间流传的小调、号子，本质上是人民情感的“集体容器”——当人民熟悉的那些旋律在街头巷尾响起时，它承载的已不仅是个人的流亡之痛，更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这种认知推动安波奔赴延安——那片被革命理想点燃的热土，也为他“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找到了实践场域。

延安时期是安波文艺生涯的黄金时代。书中以大量细节勾勒出令人动容的画面：安波怀揣笔记本，跋涉在陕北高原的沟壑间，采录秦腔、晋腔、眉户、道情等民间曲调。一年间收集数百首民歌，熟记两百余首，“小调大王”的美名背后，是他对民间艺术近乎执着的虔诚。但作者强调，安波的卓识更在于他从未将采风视为“资料积累”，而是明确提出“表达人民群众的情感，为抗战服务才是音乐采风的主要目的”。

这种理念在《怎么办》的创作中得到生动体现。书中详细还原了改编过程：安波以陕北民间“诉苦调”为基础，填入“张老三，你听我告诉你……鬼子太无理，欺负咱中国人”的生活化歌词。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转化，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亲切感，又注入了革命的时代内容。很快，这首歌在群众中“像野火一样传播”，艺术的动员力量在此得到极致彰显。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如一盏明灯，为安波的探索提供了理论支撑。毛泽东关于“小鲁艺”与“大鲁艺”的比喻——“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让安波找到了创作的“坐标系”。这种觉醒也直接催生了新秧歌运动的辉煌——1943年，安波将陕北旧调“打黄羊调”改编为《拥军花鼓》，“正月里来呀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呀了门”的明快节奏，配合“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的互动式歌词，创造了艺术与群众“共舞”的经典场景。“台下观众齐声接唱的瞬间，舞台与广场的界限消失了，艺术成为连接军民情感的纽带。”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未止于仅呈现安波的艺术成就，而是进一步揭示其作为文艺事业组织者的深远贡献。他创建胜利剧社、创办《民间音乐研究会刊》、组织

群众音乐会，如同“桥梁工程师”——既让散落乡野的民间音调在革命激流中汇集成章，又让专业文艺成果从“殿堂”走向“广场”。在主持鲁艺工作时，安波提出“粗粮为主”的办学方针：“文艺教育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我们培养的是为人民做‘精神食粮’的艺术家，不是为少数人做‘精致点心’的匠人。”这一理念直指文艺本质：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形式精致，而在于能否与人民生活产生情感共鸣。

书中特别提到安波对青年创作者的影响：他要求学生“先当农民，再当艺术家”，带领他们深入南泥湾开荒、到纺织厂劳动。这种“沉浸式体验”培养出的是一批扎根人民的文艺骨干，其影响延续至今。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安波终其一人生搭建了这样一座双向桥梁：一头深入人民生活沃土，汲取本真艺术养分；一头连接时代需求，将其提炼转化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一路壮歌——安波的成长之路》不仅展现了一位音乐家的传奇，更揭示了中国文艺蓬勃发展的根本密码：艺术需以谦卑之心向生活学习，又以创造勇气超越生活；艺术家既是人民的学生，也是时代的歌者。今天，我们的生活场域虽空前辽阔，但“为何扎根”的初心之问与“如何扎根”的实践之思依然迫切。沃土之上，歌以载民的文艺信仰不仅是安波的精神标识，更是中国文艺穿越时空、生生不息的永恒真理。这本书既是对音乐家的致敬，更是对所有文艺工作者的提醒——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真正的“人民文艺”从来不是书斋里的闭门造车。那些最动人的乐章，永远诞生于走向群众的千万里路上，酝酿于与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岁月中，在与人民心跳共振的瞬间，悄然写成。

一部“复调”的立体绘画史

汪鹏

巫鸿教授《中国绘画：元至清》的出版，标志着他“中国绘画”系列三部曲的收官。这部著作以其宏阔的视野与精密的细读，为艺术史写作树立了新的标杆。面对元明清六百年间浩如烟海的画作与画论，巫鸿没有重蹈简化与单一视角的覆辙，而是构建了一种“复调”叙事——让制度、媒材、地域、人群交织共鸣，在历史原境中立体勾勒出绘画的发展轨迹。

《中国绘画：元至清》将元至清这一时期的绘画活动置于社会结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媒材演进、地域互动与地域流动等多重维度中进行分析。在讨论明代绘画时，他并未从“明四家”直接开始，而是先设置“洪武断层”一节。这不仅是对明初绘画活动断裂这一历史事实的还原，更体现了

作者以“人的活动”打破僵硬朝代界限的史观意识——通过分析倪瓒等画家在明初的持续创作，他将看似断裂的绘画史重新连接为有机整体。这种多维度的“复调”叙事，使得绘画史不再是名家风格的独奏，而是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地域共同参与的宏大合奏。

巫鸿提出，“文人画”并非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性概念，而是文人为区别于职业画家，不断在风格、题材与技法上追求求变的动态实践。而这些创新又迅速被职业画家吸收、模仿，推动着文人画自身持续演变。因此，文人画、宫廷绘画与商业绘画之间，并非壁垒森严、彼此对立，而是存在着流动的边界和持续的互动。

同样，对于董其昌影响深远的“南北宗论”，巫鸿也将其置于晚明文画话语

权面临商业文化、宫廷趣味挑战的特定语境中理解，指出这本质上是文人群体为维护自身文化地位而进行的一种理论建构，而非对绘画史的客观描述。

为了构建立体的绘画史图景，巫鸿极大地拓宽了叙述的边界。他有意将目光投向那些被传统画史忽视的群体与现象。在画家选择上，他不仅讨论“元四家”“明四家”“清四王”等，更纳入了大量非名家却极具代表性的个案。例如，清代绘画部分，他不仅谈宫廷绘画与扬州画派，还涉及指画、界画、“以碑入画”乃至海派绘画与女性画家，展现了中国绘画传统的自我总结及其与全球视觉体系的初步交汇。

在媒材层面，巫鸿突破了以卷轴画为中心的狭隘视角。他详细探讨了壁画、折扇、屏屏、册页等在不同社会

空间与文化场域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全书甚至专设一章讨论元明清壁画，并借永乐宫纯阳殿壁画的题记，将常被“工匠化”的壁画关联至具体画家来好古，凸显了对绘画制作机制与社会动因的重视。

巫鸿实现其“立体感”写作的根基，在于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他大量运用画家同时代人的题跋、书信、评语等第一手文本，重构绘画创作与接受的原生环境。例如，在讨论清初画僧弘仁时，他引用同时代人王泰徵的记述，揭示这位被后世想象为孤僻隐士的画家，实际上拥有广泛的交游网络，从而修正了后世浪漫化的误解。

巫鸿以其敏锐的图像感知能力和精湛的文字表达能力，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浅出的“读图”之道。

读到

绿皮火车与学者史笔

李海卉

车厢摇晃，那怀石的《绿皮火车：我的回忆》中200多张泛黄的图像如时碎片般串联起一个家族百年的轨迹。与此同时，在安静的书房里，历史学家章开沅以治史的严谨态度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他将个人经历命名为《凡人琐事：我的回忆》，这些“琐事”正成为后人理解20世纪社会风景不可或缺的史料。

两种记忆轨道，在同一历史轨道上并行延伸。《绿皮火车：我的回忆》打开的是一个移动的视角。作者以童年乘坐的绿皮火车为叙事载体，车厢的摇晃成为记忆节奏的隐喻。书中穿插的家庭相册、日记、车票、毕业证书、书信等图像，与文字形成了“图文互证”结构。这种结构创造了一种沉浸式阅读体验，读者仿佛置身于那列穿越时间的绿皮火车上，透过车窗目睹一个普通家庭在时代浪潮中的起伏。

相比之下，章开沅的《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则呈现出书房式的静态沉思。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学者，章开沅的回忆录带有明显的历史学方法印记。60万字的篇幅被精心组织成15个章节，如同历史档案般系统排列：《家世与童年》《国中忆往》《投笔从戎》……这种结构本身便是史学思维的体现，将个人生命经历有序地嵌入家国历史的宏观框架中。

绿皮火车提供了平民视角下的历史细节：困难时期的一粥一饭如何被小心翼翼地分配；年轻人如何在拥挤的车厢中热烈讨论理想；少年离别时藏在行囊中的家庭照片……这些普通人的倒影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往往被忽略，却构成了真实的人际网络，使其成为一部充满人文温度的民间史。作者写道：“有些人在我生命中只是一晃而过的侧影，但我仍想写得郑重其事，因为正是这些微小的善意，支撑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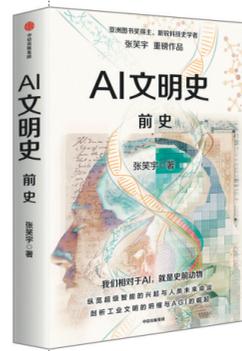
章开沅的回忆录则代表了另一种记忆传统，作为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对记忆的审慎态度体现在每个细节中，体现了纯文字叙事的深度与广度。在书成之后，他特意请学生对自己“有所知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若干人事细节，做些史实上的核对”。这种对待个人记忆如同对待历史档案的严谨，使《凡人琐事：我的回忆》超越了一般回忆录的范畴，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資料。

两种载体各有优势：图像提供直观性、情感冲击力与细节真实感；文字则提供背景脉络、深度分析和批判思考。章开沅在自序中写道：“世界上平凡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平凡人自己都不写回忆文字，后人又怎样能够理解这过去人类的大多数呢？”这位研究历史的学者，最终也将笔触转向了个体生命的微观世界。

当绿皮火车缓缓驶入终点站，乘客收起回忆的相册。每个普通家庭的故事都是时代的切片，每段个人记忆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那些摇晃的车厢里，曾坐着我们的祖辈，他们携带的行李中，不仅有简单的行囊，还有一个家族的故事、一个时代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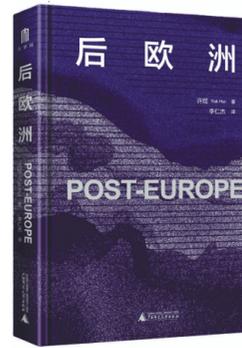
荐书

漫游与推演



《AI 文明史·前史》
中信出版集团

新锐科技史学者、天津奖得主张笑宇讲述“AI 文明史”，从AI文明的视角回望当下这一新旧纪元交替的关键时期。在智能文明破晓的奇点前夜，他以文明史范式为锚，率先校准技术与人文的天平；不仅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叙事空白，更为人类应对AI时代的变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罗盘。



《后欧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知名哲学家许煜的全新自传式哲学力作，也是通往其哲学体系的理想入门读物。面对海德格尔预言的“无家可归”的命运困境，许煜以自身漫游经历为底色，聚焦后欧洲核心命题，回应全球化与技术发展带来的归宿危机，是一本兼具国际视野与深切现实关怀的好书。



《小说如何思考》
中信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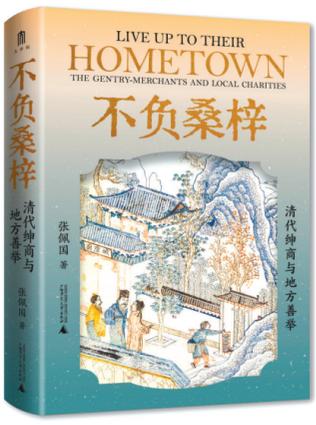
本书聚焦于18世纪、19世纪英国小说，以当代理论为参照，细读笛福、奥斯汀、司各特、勃朗特、哈葛德等人的小说文本。作者将小说视为一种思考的过程或者是具有建构性力量的“算法”，一次次推演、计算与个体和社会、欲望和规则等相关的变量，从而揭示其内在的矛盾和局限性。

清代绅商的乡善实践与桑梓仁心

刘江涛

提示

《不负桑梓：清代绅商与地方善举》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揭示了清代绅商慈善活动的复杂肌理。作者通过嘉定善堂、佛山书院、海宁水利等六个鲜活案例，生动呈现出一群群体如何将儒家“仁爱”思想与“教化”使命，转化为赈灾、兴学、修桥等具体的地方实践。书中尤为精彩地剖析了慈善背后儒家伦理、地域认同与现实利益的精妙交织，并提出了“善举贡赋化”等创新概念。



《不负桑梓：清代绅商与地方善举》（以下简称《不负桑梓》）一书对清代绅商

群体的地方慈善活动进行了深入考察，它通过赈灾、兴学、育婴等具体善举为切入点，勾勒出绅商阶层在地方善举中的实践图景。作者张佩国是历史学者，他将这些善举置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动态框架中分析，揭示出清代地方治理中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互动与协商，阐明了慈善不仅是道德实践，更是社会权力运作与文化秩序建立的重要场域。

儒家伦理对清代绅商慈善活动的影响，是全书的分析重点之一。书中既有具体案例的深入剖析，又有宏观视角的理论建构，为理解清代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视角。作者通过多个案例展示了儒家思想如何具体指导慈善实践。“仁爱”思想是绅商从事慈善活动的核心动力之一。与西方基于宗教的慈善理念不同，清代绅商的善举更多源于儒家“仁者爱人”的理念。

嘉定县善堂的创建者在记述中频繁引用《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语句，将慈善视为实现个人道德完善与社会和谐统一的途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使绅商将地方慈善视为实践儒家政治理想的基础。佛山镇的绅商通过主导书院、社学，掌控儒家教化与科举资源，并巩固其在地方社会的权威。从面向士著的崇正书院到面向侨寓人士的田心书院，二者的此消彼长也反映了不同绅商群体在地方教育领域影响力的变化。“义利之辨”在绅商慈善活动中呈现出复杂面向。作者没有简单地将绅商善举归为纯粹的道德行为，而是揭

示了其中儒家伦理与现实利益的交织。例如在海宁州水利工程中，地方绅商的捐赠既出于保障乡土安全的“大义”，也包含了保护自身土地财产的“实利”。

兴学是书中分析尤为深入的案例，生动展示了儒家伦理如何通过具体善举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在清代佛山，教育机构成为不同地方势力角逐影响力的重要场域。士绅阶层通过主导书院、社学，不仅传播儒家教化，而且实际掌控了科举资源，从而巩固其权威。庙产常成为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其支配权之争体现了地方权力的博弈。各方力量的合作与竞争，共同塑造了佛山地方教育乃至社会权力的变迁格局。绅商兴学活动中的“教化”使命，体现了儒家“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通过教育，绅商不仅传播知识，更在塑造地方社会的文化秩序与价值观。这种以慈善为载体的教化活动，使绅商在地方社会中获得了道德权威与文化领导地位。

《不负桑梓》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善举贡赋化”“绅权的二重支配”等创新性学术概念。这些概念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清代慈善活动的本质。作者受到“二重生产方式”理论的启发，将贡赋制生产方式与小资本生产方式的相互融合作为分析框架。这一视角超越了将慈善简单地视为道德行为的传统理解。作者特别强调“历史本体论”的解释方法，试图寻找一个系统性的、本质性的、整体性的历史动力学解释。这一方法论立场使研究不仅停留在经验描述层面，更深入探讨了慈善实践背后的深层社

会机制。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不负桑梓》在可读性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可读性作为从读者角度出发衡量文本难度的指标，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考虑。书中通过生动的案例叙事，将抽象的理论分析与具体的人物故事相结合。例如在描述佛山镇的慈善教育时，作者不仅分析制度结构，还呈现了具体绅商个体的动机与行动。这种叙述方式使专业的历史研究能够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打破了学术著作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隔阂。作者的语言既有学术严谨性，又不失文采飞扬。在对海宁州水利工程的描述中，既精确呈现了工程的技术细节与组织机制，又生动描绘了绅商、官员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场景。这种平衡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努力，使本书成为一部既适合专业研究者，也适合对清代社会史感兴趣的读者的作品。

儒家伦理虽是绅商慈善的重要动力，但现实利益考量同样不可忽视。书中通过多个案例揭示了慈善活动中的复杂利益维度。在嘉定县善堂的运营中，地方绅商通过主导慈善组织，实际上也在增强自身在地方事务中的话语权。慈善成为绅商积累社会资本、扩大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晚清海宁州的水利工程中，绅商的捐款既有助于解决水患问题，也直接保护了自身的农田与商业利益。这种“利己”与“利己”的交织，展现了慈善活动的多维面向。庙产作为办学经费来源的支配权之争，更是直接体现了地方权力的博弈。慈善资源的掌控成为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